

20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

张青仁

19世纪初墨西哥实现国家独立后,开始探索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在对白人至上的进化论的批判中,墨西哥社会出现了对本土国民性的思考。20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一种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确立。革命制度党政府将民族融合的主张贯彻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中,一方面,肯定了本土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墨西哥民族国家之根溯源到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统一教育的推广,以及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实现对印第安人的整合与控制,将印第安人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以此完成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革命制度党政府所推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虽然存在将土著人边缘化、同化的倾向,以及对土著人权益与政治参与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但其彻底改变了殖民时代以来印第安人不被认可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殖民时代以来困扰墨西哥社会发展的土著人问题,有助于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的安定。

关键词:墨西哥 民族国家 一体化 印第安人

作者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国家民委区域国别研究基地“拉丁美洲社会文化中心”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从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东海岸登陆,西班牙殖民者入侵阿兹特克帝国,到1821年9月28日伊图尔维德(Iturbide)率领部队开进墨西哥城,完成墨西哥的独立,^①在遭受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墨西哥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之路。

与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不同,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墨西哥,占据主体地位的是融合了白人与印第安人(Indígenas)^②血统的混血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白人、印第安人也是墨西哥社会中的显性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平复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建构一个包容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事实的认知框架,在统一国家的认同下完成对多元族群的身份建构,在实践层面上推动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设,成为独立后墨西哥政府必须思考与面对的问题。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不同时期的墨西哥政府与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回应,并体现

^{*}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困境研究”(项目编号:18CMZ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王文仙:《克里奥尔人与墨西哥的独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17届年会暨“纪念拉美独立2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年,第60页。

^② 本文仅在指代层面上使用“印第安人”“土著人”两个概念指称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美洲大陆的原住人群体,并不涉及对这两个概念的文化批评。

为官方一系列政策动向。

墨西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虽然独立战争使墨西哥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设一直到 20 世纪初经过墨西哥大革命,革命制度党执政后才逐渐完成。对于 20 世纪初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的这段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国有学者认为,20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发生了一次文化革新运动。此次文化革新运动是将“印第安人纳入墨西哥民族,确立墨西哥民族种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塑造墨西哥‘新人’的运动”。基于从文化民族主义、土著主义、反教权、教育改革、壁画运动、革命小说、电影与流亡知识分子等八个层面对这一运动进行分析,他们认为 20 世纪初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是墨西哥人的又一场独立运动,是墨西哥人克服文化与心理自卑,获得精神解放,进而实现现代化的一次运动。^① 这些论述充分注意到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对理解 20 世纪初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一定的意义。目前,仍然需要明晰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立固然是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但更是将底层的印第安人纳入民族国家范畴,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重新认知白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确立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过程。其次,这场文化革新运动,实质是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方案在文化实践上的渗透,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时段墨西哥国内与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与政治实践,从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层次上对此进行把握。

相较于我国学者对革命制度党主导下墨西哥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评价,墨西哥本土的部分学者对这段历史则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革命制度党执政下民族国家建设实践是对印第安人的同化,也是对印第安人权益的剥夺,是一种屈从于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② 诚然,革命制度党执政下的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忽视印第安人权利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践是在殖民以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持续存在的情形下,墨西哥联邦政府和知识精英在民族主义与独立国家共识的基础上,试图超越族群区隔与阶序性的社会经济秩序,建立包容多元族群事实、取得多元族群认同的认识论基础的形成过程。这一方案与实践,不仅是国家权力、统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意见表达,亦有印第安人政治与社会理想的融入,甚至不少印第安人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 20 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等同于对印第安人的同化和对印第安人权利的剥夺。

基于此,本文在对 19 世纪墨西哥独立后社会思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打破政治与文化的区隔,从社会思潮、思想理念到政策实践三个维度对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与实践进行分析。本文是一项关于国家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分析。换言之,本文对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并非仅是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而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探讨包括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印第安人在内的国民主体,探讨在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中,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实体是如何理解自我、呈现形貌并付诸实践的过程。

一、从白人至上的进化论到墨西哥国民性的反思

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后,虽然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对待混血、通婚相对包容的态度造就了

^① 韩琦:《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 页。

^② Guillermo Castillo Ramírez, “Integración, mestizaje y nacionalismo en el México revolucionario: Forjando Patria de Manuel Gamio: La diversidad subordinada al afán de unidad,”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Vol. 59, No. 221, 2014.

梅斯蒂索人作为墨西哥社会主体族群的事实,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公正对待墨西哥社会各个族群,而是建立了以白人为主的种族制度。欧洲白人是殖民地社会的绝对权力者,位于其下的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土生白人,也称为克里奥尔人(Criollos),混血的梅斯蒂索人是低于克里奥尔人的存在,印第安人与黑人则是这个社会的底边阶层。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被来自西班牙的欧洲白人掌控,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与少数黑人遭受其他阶层的层层剥削,失去土地、资本,成为依附于殖民者权贵阶层的存在。殖民统治后期,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的改革激化了殖民地社会的矛盾,推动着墨西哥土生白人阶层的崛起及其与其他族群的联合。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动员下,墨西哥本土社会的多元族群,团结在了本地化的天主教圣母瓜达卢佩(la Virgen de Guadalupe)^①的旗帜下,联合推翻了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然而,独立后的墨西哥,并没有做好民族国家建设的制度准备。战争平息后,以白人为主的种族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墨西哥国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区隔与歧视。

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论点开始席卷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多个国家。这一思潮与拉美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潮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国家对待有色人种的拒斥态度。包括阿根廷思想家阿韦蒂(Alberdi)、萨缪托(Sarmiento),以及智利的思想家拉斯塔里亚(Lastarria)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表示出对欧洲白人的高度认同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强烈鄙视,认为印第安人、黑人是尚未开化的落后种族,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混血与通婚是一种“退化的、可耻的行为”。最为激进的当属萨缪托,他甚至主张引进盎格鲁-撒克逊白人,通过提高白人的数量来改进拉丁美洲的“种族质量”。^②在墨西哥,胡斯托·谢拉(Justo Sierra)是进化论的典型代表。谢拉是孔德与斯宾塞思想的狂热追求者,在《墨西哥人民的政治进化》(*Evolución política del pueblo mexicano*)中,他主张必须通过生物和文化上的“杂交”(cruzamiento)改善印第安人种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通过教育启蒙土著人的心智,以此实现墨西哥的“进化”(evolución)。^③值得一提的是,谢拉活跃之时,正是墨西哥历史上的波菲里奥时代。执政的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总统是一位坚定的进化论者,主张“以进化替代革命”。在他执政期间,谢拉曾担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长和艺术部的副部长,参与设计了多个公共教育的改革计划,其主张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实践。

虽然进化论思想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却并没有得到拉美人民的真正认同与普遍接受,原因首先在于进化论思想自身的局限性。白人并非拉丁美洲国家的主体族群。此外,白人内部还存在着来自欧洲的白人与拉丁美洲土生白人的区别,两者对待白人文化的认同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化论对欧洲白人的极端推崇在事实层面上否定了作为拉美社会主体的梅斯蒂索人的地位,也没有承认拉美土生白人的合法性,必然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进化论与白人至上论的核心是欧洲文明中心论,这一主张试图通过对拉丁美洲文明与族群的否定,确立欧洲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与未来发展方向。显然,进化论对内并没有解决拉丁美洲民族国家统一性的问题,对外也没有承认拉丁美洲混合文明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社会事实,也没有明晰

^① 瓜达卢佩圣母起源于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最初是西班牙天主教收复穆斯林所占土地的象征。在天主教传入墨西哥的过程中,这一神灵融合了墨西哥特佩亚克附近日月星辰之母的科亚特利库埃(Coatlícuē)的元素,演变为上帝之母的“瓜达卢佩”。保留了本土印第安女性的面庞和身着蓝绿色衣服的瓜达卢佩圣母,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广泛认可,成为墨西哥天主教的象征。

^② D. F. Sarmiento, *Conflicto y armonías de razas en América*, Buenos Aires: S. Oswald, 1883, pp. 354—355.

^③ Justo Sierra, *Evolución política del pueblo mexicano*, Ciudad de México: Editorial Porrúa, 1959, pp. 310—311.

拉丁美洲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的地位,很快就遭到了拉丁美洲学者的抛弃。

拉美学界对进化论的批判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了北部的美国,希望借助同是有着殖民历史的美国的力量,彻底斩断殖民体系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支配,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拉丁美洲的独立与富强。然而,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征战与掠夺造成了“说英语的美洲”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的区隔。在发现这一残酷的事实后,哥伦比亚人何塞·玛利亚·托里斯·凯塞多(José María Torres Caicedo)在其著名的诗篇《两个美洲》(*Las dos Américas*)中痛心疾首地写道:“这个美洲的合众国忘记了正义和责任,普世之爱的神圣法则禁止这种遗忘。”^①意识到美国殖民主义继承者的身份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开始了本土民族主义的探索之路。

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的爆发,1861年至1867年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进一步推动着墨西哥民族主义思潮的生长。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Andrés Molina Enríquez)是迪亚斯执政晚期墨西哥著名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中,恩里克斯提出“建立墨西哥祖国”(Hacer la patria mexicana)的观点,^②并超越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混血人种的污名化定性,将混血人种提升至墨西哥民族的高度。恩里克斯将混血人种描述为“西班牙元素和土著元素的合体”,认为混血种族并不是一个新的种族,而是被西班牙血统改造过的土著种族。混血种族超越了血统单一的原住民、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保留了每个渊源种族的精髓。进而,恩里克斯声称混血种族将是“白人种族”的“先进进化”,也是对“土著种族”的“先进选择”,是一个“自由并具有革命性”的群体,是真正的墨西哥人。^③虽然恩里克斯对混血种族的过分拔高,以及对混血之于白人和印第安人“进化”“洗涤”的论述依然有着进化论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恩里克斯对于混血人种的定性却是革命性的,体现着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包容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事实的知识范畴的努力,为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打下了新的认识论基础。

二、20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民族融合思想的形成

迪亚斯执政末期,他的独裁统治激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零星出现的反抗运动最终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墨西哥大革命。漫长的革命、军阀的混战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对墨西哥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项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墨西哥大革命却提供了一个变革殖民时代的统治秩序,重组政权与整合社会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不同于殖民时代以降的主张民族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确立。

在反对迪亚斯独裁的斗争中,以白人核心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主张遭到进一步的批判。随着拉丁美洲与墨西哥社会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发展,阐述墨西哥民族国家、拉美文化与世界秩序之间关系,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浮出水面,这首先表现在墨西哥人类学之父曼努埃尔·加米奥(Manuel Gamio)的主张上。1910年,跟随博厄斯(Franz Boas)学习,刚从美国

^① José María Torres Caicedo, *Religion, patria y amor; colección de versos escritos*, Paris: Th. Ducassois, 1863, p. 454, 有关翻译可参见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② Andrés Molina Enríquez, *Los grandes problemas nacionales*, Ciudad de México: Imprenta de A. Carranza e Hijos, 1909, p. 71.

^③ Andrés Molina Enríquez, *Los grandes problemas nacionales*, p. 344.

获得人类学学位的加米奥返回墨西哥。回国后,加米奥推动成立了人类学理事会,开始了对奥蒂瓦坎山谷人口的经典区域研究。1916年,加米奥出版了《锻造祖国》(*Forjando patria*),系统阐释了墨西哥国民性与民族国家建设路径的思考。在对殖民时代以来墨西哥历史的回顾中,他驳斥了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墨西哥文明卑劣的定性,认为评价“民族有无文化的做法已经过时,因为我们无法给文化或者文明这个词语赋予绝对的价值”,“仅仅因为墨西哥不同于欧洲和北美文明的特征,将其定义为未开化的,是不合适的”。^①加米奥还认为,导致墨西哥数百年来混乱与战争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中心论对墨西哥历史建构的苍白、混乱与无序。种族的异质性与多元性是墨西哥文明的特征。包括西班牙殖民者及其后裔在内的封建知识分子,摒弃了由土著血统构成的墨西哥社会的多数派,在宪法的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中造成了土著人与墨西哥社会的区隔,以及对墨西哥民族的污名化。^②

在加米奥看来,墨西哥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种族与文明:第一种是土著种族或土著血统占优势的人种。虽然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坚定的反抗精神,却不知道自我救赎的方式,也无法与现代社会适应。第二种是混血人种。这个阶层是永恒的反叛者,是族群、阶级纯正性的反对者,是唯一生产知识的中间阶级。这个群体不是完全拥抱西方文化的分裂分子,也非拒不接受变化的土著人,而是吸收了两种文明的成果,创造了具有活力的“中间文化”(cultura media)。第三种由墨西哥外国人的近亲或远亲后裔构成,他们的血统很少与中产阶级混合,与土著人没有任何交集。他们是墨西哥社会顽固的贵族阶层,是墨西哥进步发展的阻碍。基于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与文化共生的事实,加米奥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包容墨西哥所有族群真实信息的历史阐释,在种族融合、文化表现融合、语言统一和经济均衡四个层面上实现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加米奥进而直接主张,墨西哥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混血种族及其文明的基础之上的。混血人种是墨西哥民族的主要构成,其所持有的融合性的文化表达可以作为墨西哥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模板,是为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服务的文化形式。^③

针对民族国家的建设路径,加米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认为,首先,应当从墨西哥人口构成而非欧洲人的视角制定普遍意义上的宪法与法律。^④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应当建立一个为所有族群共享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加米奥用家庭进行比喻,认为“一个家庭要和谐团结,所有成员都必须享有确保他们身心健康的经济资源。一个家庭要形成和谐的整体,形成一个族群,就必须让所有人都享有可以享受的福祉,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⑤再次,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种族与文化的融合。这种教育并非欧洲扫盲式的教育,而是将墨西哥的历史渊源与当下社会状况融合,将民族主义融入其中。关于印第安人的教育是实现种族与文化融合的重点。这一教育并非只是教他们学习西班牙语,教他们穿着混血人种的服饰等外表、形式上的教育,而是致力于让印第安人融入混血传统的墨西哥社会。通过对混血文明的教育,真正促进印第安人对于混血文明的认同。对于混血人种外的其他种族,亦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了解前哥伦布时代至今土著艺术的技术和特征,在认同墨西哥混血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实现墨

①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Ciudad de México: Librería de Porrúa Hermanos, 1916, p. 213.

②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pp. 23-24.

③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pp. 167-169.

④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pp. 129-130.

⑤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pp. 15-16.

西哥文明的本土溯源。^①

差不多同一时期,墨西哥知识分子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从世界文明的秩序中,对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混血人种与混血文明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进行了再次确认。在1924年出版的《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中,巴斯孔塞洛斯明确地肯定了拉丁美洲文明的主体性与合法性,在对欧洲殖民者征服拉美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巴斯孔塞洛斯清醒地意识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的张力关系,以及对拉丁美洲文明持久的征服与冲突。“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拉丁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冲突;制度、目标和理想的冲突……我们不仅在战斗中失败;在意识形态上,盎格鲁人继续征服我们”。^②巴斯孔塞洛斯进而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殖民秩序与世界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殖民时代以降,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并非是对世界人民的真正联结。殖民征服、种族主义强化了人类的区隔,造成了世界冲突与历史危机的出现。在西方殖民主义及其余毒持续存在的情形下,联结人类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拉丁美洲人民身上。在白人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与殖民统治中,拉丁美洲出现黑人、印第安人、蒙古人和白人融合的混血儿。混血种族的出现,不仅是不同族群、人种肉体上的融合,更是精神与文化的融合。这是拉丁美洲之于人类社会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巴斯孔塞洛斯强调,混血种族是一种“最终种族(*la raza definitiva*)、综合种族(*la raza síntesis*)、整体种族(*la raza integral*),由所有民族的天才和血液组成。因此,这一种族更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兄弟情谊和真正的普世愿景”。^③混血种族的出现是种族发展与进步的结果,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④巴斯孔塞洛斯对混血族群与文明的认知,完全否定了进化论范式下种族主义对拉丁美洲混血传统的污名化标签,赋予了混血种族与文明的合法性,强调了其作为拉美社会标志性特征的重要意义;此外,还从人类社会与世界人民的高度,论述了拉丁美洲混血种族与混血文明在超越殖民以降种族、文明与国家的冲突与区隔,创造为世界人民所共享的文明形态,建构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的和平秩序的重要意义。

加米奥与巴斯孔塞洛斯的论述标志着一种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墨西哥的完整生成。在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语境下,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打破了欧洲殖民者种族主义和进化论对混血概念污名化、边缘化的建构,确立了混血族群作为墨西哥主体民族的地位,由此完成了墨西哥民族性的探寻与建构。在民族融合的理念下,沟通不同族群的种族与文化融合的混血身份成为墨西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将墨西哥民族的认同来源归于本土的印第安文明,而非是种族主义阶序中“高等级”的白人文明,这显示出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对民族身份建构的独立探索。

另外,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加米奥与巴斯孔塞洛斯都曾在墨西哥政府中担任要职,两人均在执政过程中实践着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系列主张。巴斯孔塞洛斯曾先后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和公共教育部长(*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在他的力推下,墨西哥教育和文化部门致力于梳理墨西哥本土文明的历史,挖掘本土印第安文明与混合文化的资源,改变欧洲

① Manuel Gamio, *Forjando patria; Pro-Nacionalismo*, pp. 307—323.

② 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Misión de la raza iberoamericana*, Ciudad de México: Editorial Trillas, 1948, p. 17.

③ 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Misión de la raza iberoamericana*, p. 30.

④ 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Misión de la raza iberoamericana*, p. 36.

文明充斥墨西哥社会的状况,以民族艺术服务于国家建设。例如,在土著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了墨西哥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强化着他们对于墨西哥本土文明的感受与认知。作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加米奥在墨西哥大革命后先后担任发展部乡村人口、国有土地与殖民化局(Población Rural, Terrenos Nacionales y Colonización de la Secretaría de Fomento)的局长、国家人口局(Departamento Demográfico)局长、美洲印第安人研究所(Instituto Indigenista Interamericano)所长等职务,对大革命后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革命制度党政府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实践

1929年3月4日,墨西哥全国政治俱乐部和地方政党举行代表大会联合成立了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 PNR),1939年改组为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汇集墨西哥社会各个阶层、代表普罗大众诉求的革命制度党人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的政治冲突,建立一个凝聚所有阶层、包容各个族裔,为社会进步与民众福祉带来收益的社会体系,以此实现大革命后墨西哥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对加米奥和巴斯孔塞洛斯等人思想吸收的基础上,革命制度党政府改变了殖民时代以来排他性的种族主义理念,开始实施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政策。革命制度党政府一方面肯定了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民族国家的象征溯源至殖民时代前的土著社会;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致力于建设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整合及其融入民族国家的体系,大力推进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

(一)文化民族主义基础上印第安文明作为国家象征的确立

大革命后的墨西哥,有两个可以追溯的文化传统: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文明传统,二是本土历史悠久的印第安文明传统。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早已将民族国家认同的来源投向了本土历史悠久的土著文明,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执政面向。在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外,在文化层面上确认墨西哥民族国家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内则强化多个民族的整合,试图完成墨西哥人与墨西哥文化身份象征的建设。

对于土著文明挖掘与认同的建构肇始于人类学学者兼政府官员的加米奥。他在圣·米格尔·阿曼特拉(San Miguel Amantla)、阿斯卡波查尔科(Azcapotzalco)和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土著印第安文明的瑰丽辉煌,并强调了土著文明有能力、有资格担当混血种族的基石。^①他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共同致力于论证印第安文明在墨西哥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于挖掘、呈现墨西哥民族起源的学术机构纷纷设立,人类学成为这些学术机构的支撑学科。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总统于1921年在公共教育部下创建了土著民族教育和文

^① Fernando Armstrong-Fumero,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Manuel Gamio and Forjando Patria: Anthropology in Times of Revolution," in Manuel Gamio, *Forging a Nation*. Loui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0, pp. 9-10.

化部,致力于研究土著社会的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①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墨西哥相继成立了一系列人类学机构,其中包括1934年设立的印第安事务部(Departamento de Asuntos Indígenas),1937年发起的墨西哥人类学学会(La Sociedad Mexicana de Antropología),1938年创立的国立人类学历史学院(Escuela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1939年设立的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以及1948年创立的国立印第安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

在国家机关、人类学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下,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国家象征与文明根基的地位得到确认。在这一系列文化实践中,壁画运动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以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奎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为代表的艺术家,利用公共空间,将土著文明的元素融入壁画中,创作了数百平方米的公共壁画。这些融入土著元素的壁画作品,极大提升了土著人及其文明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并以壁画这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艺术形式强化了民众对土著文明的感知。^②此外,这些有着土著元素的壁画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它们作为墨西哥文化的象征成为西方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壁画外,土著舞蹈、电影、音乐、诗歌和文学方面的成果也得到了深入挖掘。随着更多的土著遗址被发现,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象征的地位日益巩固。1964年,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在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一侧落成。这座占地面积1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的巨大博物馆,陈列了包括特奥蒂瓦坎文明(civilización Teotihuacán)、托尔特克文明(civilización tolteca)、阿兹特克文明(civilización azteca)、玛雅文明(civilización maya)在内的大量土著文明考古遗迹。矗立在博物馆门口迎风飘扬的墨西哥国旗,不断强化土著文明的国家象征。

事实上,墨西哥政府对土著文明的挖掘展示,以及在此基础上诸多公共文化设施的设立,不仅体现了以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国家象征的确立,还在于以公共艺术的方式,强化民众对墨西哥土著文明的感知,实现对民众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提升土著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豪感的同时,使其以当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艺术形式表述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改变过往墨西哥社会为西方艺术主导的状况,使墨西哥社会的多元族群真正理解与他们联系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的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土著艺术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融合,既是对墨西哥社会混血文明历史的呈现,其自身亦是墨西哥文化混合的重要组成。

(二)对印第安人的整合

除在文化层次上确定民族国家的象征认同外,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整合墨西哥境内的各个族群、构建多元族群整合共生的社会制度框架成为革命制度党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革命制度党政府接受了加米奥等人的主张,但在残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认为少数欧洲裔的白人并不会对政府的统一与稳定产生威胁。同时还认为,虽然在象征层面上赋予了土著人及其文明的主体地位,但这些完全本土的、非混血的且在国民构成中占据较大比重的印第安人是民族国家潜在的分裂对象。由此,革命制度党政府将对国家整合的重点放在了

^① Rodolfo Stavenhagen, "La política indigenista del Estado mexicano y los pueblos indígenas en el siglo XX," en Bruno Baronnet y Medardo Tapia Uribe ed., *Educación e Interculturalidad: política y políticas*. Cuernavaca: CRIM-UNAM, 2013, pp. 23-48.

^② 韩琦:《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与现代化》,第255-261页。

印第安人身上,对印第安人的整合教育和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成为革命制度党执政后政策的重要面向。

第一,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整合。

墨西哥教育机构的转型在大革命期间就已经发生。1914年,以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代表的自由主义力量推翻篡权者韦尔塔(Huerta)政权,宣布废除迪亚斯时期的政治长官(Prefecto político)制度,建立自由的市政系统,这直接宣告了社会发展与教育机制的转型。^①然而,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制并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教育局面,最终导致联邦、州政府对教育控制的加强。1921年,在奥夫雷贡总统的支持下,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负责组建了公共教育部(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SEP),^②这是联邦第一次设立管辖全国教育的权力机关。设立公共教育部的目的在于将印第安人整合至民族国家的序列。公共教育部通过农村学校的设立,逐渐强化联邦政府对地方教育系统的控制。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曲折的,充满着反复、冲突和协商,但必须承认的是,正是在联邦公共教育部的持续推动下,职业的、专门的官僚机构逐渐取代了以往时代地方长官的个人权威,成为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1930年后,随着革命制度党统治的日益稳定,联邦政府对基层教育的控制越发强化。甚至可以说,与联邦政府紧密结合的教育体系是大革命后墨西哥教育发展的基本面向。在建构统一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对土著人整合的教育成为联邦教育机构的首要职责。

公共教育部设立后不久,这一机构下设的土著民族教育与文化局就开始了对土著农村教育的改革,在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大规模设立学校。在墨西哥东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当时共有400万左右的土著人口,其中200万人只能使用土著语言。1924年底,联邦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立了1000多所学校,总共有1146名教师为65,300名土著学生提供服务。1925年,农村地区的联邦学校统归教育部下属的农村土著文化融合乡村学校局(Departamento de Escuelas Rurales de Incorporación Cultural Indígena)管理,该局致力于提升土著儿童的教育水平与发展水平。^③首先要求所管学校致力于向学生普及西班牙语,提升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帮助其融入墨西哥主流社会。其次,联邦政府亦希望通过这些乡村学校的设立,取代教会在村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此外,联邦政府开始向土著地区派遣教育特派团,在土著地区开展文化宣教,向原住民提供各种知识服务。

1925年开始推广的“印第安学生之家”(La Casa del Estudiante Indígena)计划是一个更为激进的项目。这一计划将印第安乡村社区的学生聚集到首都墨西哥城,让他们经受现代文明的洗礼,改变思维方式与风俗习惯,消除印第安人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强化他们对墨西哥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掌握西班牙语,习得主流阶层的生活习惯,结束学习后,这些学生将返回原来的村社。他们把在“印第安学生之家”习得的文化传播给所在的社区,实现对整个社群的改造。时任教育部长的何塞·曼努埃尔·普伊赫·卡萨乌兰科(José Manuel Puig Casauranc)认为,

^① Elsie Rockwell, *Hacer escuela, hacer estado: la educación posrevolucionaria vista desde Tlaxcala*, Zamora: El Colegio de Michoacán & CIESAS & CINVESTAV, 2007, p. 72.

^② Fabio Moraga Valle, “Las ideas pedagógicas de Tolstoi y Tagore en el proyecto vasconcelista de educación, 1921—1964,” *Historia mexicana*, Vol. 65, No. 3, 2016.

^③ Rodolfo Stavenhagen, “La política indigenista del Estado mexicano y los pueblos indígenas en el siglo XX,” en Bruno Baronnet y Medardo Tapia Uribe ed., *Educación e Interculturalidad: política y políticas*, Cuernavaca: CRIM—UNAM, 2013, p. 27.

“印第安学生之家”的设立,能够基于“以点带面”的方式完成对整个印第安族群的教化。将学生们从农村带到城市,使其与城市居民接触,也有助于消除城市居民对土著人民的不信任,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大部分土著学生完成学习后并不愿意回到土著社区,而是选择在首都谋生。鉴于此,位于墨西哥城的“印第安学生之家”在 1933 年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在州一级层面上设立的土著寄宿学校。^①

面对“印第安学生之家”的失败,革命制度党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整合重点放在了乡村土著学校的扫盲与西班牙语的推广普及上。基于大部分土著社区没有西班牙语使用环境的事实,墨西哥教育部门一直在探索建立适宜于土著社区的扫盲和西班牙语普及方案。卡德纳斯(Cárdenas)执政期间(1934—1940),与北美福音派组织合作,成立了墨西哥夏季语言培训班(el Instituto Lingüístico de Verano en México),以宗教教育的方式,致力在土著社区普及西班牙语。此后,经过不断的探索,最终形成了先用土著语言扫盲,再用土著语言传授西班牙语的教学方式。这一模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最终演变为印第安社区的双语教育模式。此外,墨西哥政府还设立了多个“土著协调中心”,致力于提升土著人的西班牙语使用水平,强化国民教育,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土著地区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②

第二,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对印第安人的控制与整合。

从殖民时代至 20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结束,在墨西哥漫长的历史中,在种族主义、殖民体系的阶序建构中,墨西哥社会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能够实现广泛动员的、控制各个阶层的统治力量。在经历了大革命的长期动荡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权的、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实现对国家主权与安全的维护。虽然这是一个以集权为特征,自上而下建立的统治秩序,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政治秩序完全服从服务于政府的诉求,以及民主与正义的缺失。相反,为了真正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制度党在建立垂直的统治秩序、实现对民众控制的同时,也力求满足不同种族、阶层民众的诉求,由此形成了政治约束和利益诱导并存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了国家秩序的长期稳定。

一般观点认为,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形成与革命制度党相关,至少在 1929 年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家革命党上台后,墨西哥的政治体制才表现出国家社团主义的特征。事实上,早在墨西哥大革命之初,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雏形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遍布城乡的人民组织就已经试图与统治阶层达成一定的结盟关系。在农村,个体的小生产者以土地分配和整合中小型农业生产的名义被纳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公社里;在城市,劳动立法的推进与教育、卫生和住房等保障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强化着普罗大众对革命政权的认同。尤其是 1917 年宪法的颁布,体现了革命政权的承诺,极大提升了民众对革命政府的认可。最终,革命制度党上台后,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时期,一个将农民、工人、社会大众和教师等所有墨西哥民众整合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最终建立。^③ 具体而言,1938 年,卡德纳斯总统在对国民革命党改组后,在党内按照工人、农民、人民和军人等非地

^① Engracia Loyo, “La empresa redentora. La casa del estudiante indígena,” *Historia mexicana*, Vol. 46, No. 1, 1996.

^② Margarita SANTOYO, José ARELLANO, “El instituto lingüístico de verano y el protestantismo en México,” *Convergencia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Vol. 4, No. 14, 2018.

^③ Hubert C. de Grammont y Horacio Mackinlay, “Las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campesinas e indígenas frente a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y el Estado, México 1938—2006,”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8, No. 4, 2006.

域性职业社会团体性质,把党划分为工人部(el sector obrero)、农民部(el sector agrario)、人民部(el sector popular)和军人部(el sector militar)四个部门。1940年,军人部取消,原来的四个部变成了三个部。其中,工人部主要包括城市的劳工,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CTM)领导;农民部由全国农民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mpesina,CNC)领导,土著人被划入这一团体内;人民部包括政府雇员和教师联合会,是小土地所有者、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组织,由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CNOP)领导。^①

在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制度党迫切需要建立既忠于革命制度党,又能有效管理土著社区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土著社群的整合。原因如下:第一,土著地方社会长期存在传统的、本土性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权力对这一区域的管控。第二,如前所述,革命政府一直致力于从教育层面对印第安人的整合,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出现无疑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诉求。第三,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试图通过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建立,强化职业身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地位,以此实现社会经济层次上的农民身份,取代文化层次上的土著身份。因此,在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形成后,革命制度党政府迅速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广袤的印第安农村地区。

对于土著人而言,促使他们接受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加入农民职业社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职业社团在土地改革与分配中的垄断地位。土地问题是墨西哥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土著族群中,一直流传着土地母亲和太阳父亲孕育人类的神话。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更是赐予他们力量、支撑他们生活的神圣象征。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后,掠夺了土著人的土地,建立了农业大庄园,强迫土著人为其劳作。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持续抵抗。墨西哥独立后,崛起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沿袭了殖民时代的土地政策,他们试图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在经济层面上消解作为土著社群共同财产的土地,祛除土著身份与认同对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威胁,完成对土著人的彻底整合与改造。20世纪初,墨西哥国内占人口0.2%的地主拥有87%的土地,91%的乡村人口却缺少土地。土地分配不均成为墨西哥社会的严重问题,直接导致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的爆发。^②“土地与自由”甚至成为墨西哥大革命的标志性口号。墨西哥大革命后,1917年通过的宪法第27条,承认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将土地归还给土著社区与民众。这是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殖民时代以来土著人土地诉求的回应,表达着革命政府力求缓和与土著人的关系,实现政治稳定的诉求。然而,这一法律却并没有规定政府如何将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以及如何实现土地资源分配的路径。卡兰萨总统执政期间,初步形成了依托社区向土著人分配土地的方案。革命制度党执政后,卡德纳斯总统亦倾向于以直接捐赠给村社(ejidal)的方式分配土地,由此促成了基层村社成为土地分配新的政治单位。革命制度党选择一些农户(ejidatarios)作为他们忠诚的代理人,并将村社委员会(comisariado ejidal)转变为革命制度党政府与基层村社之间绝对的中间人。土地分配机制建立后,国家层面上的农民职业社团——全国农民联合会于

^① 夏敏:《国家社团主义制度与政治衰败》,《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1期。

^② Armando Bartray y Gerardo Otero,“Movimientos indígenas campesinos en México: la lucha por la tierra, la autonomía y la democracia,”en Sam Moyo y Paris Yeros ed.,*Recuperando la tierra. El resurgimiento de movimientos rurales en África, Asia y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CLACSO,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2008,pp.401-428.

1938 年迅速成立,并在全国的土地分配中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所有为土地而战、希望获得土地分配的社区都加入了这一职业社团中。^①

在全国农民联合会以外,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墨西哥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新的农民组织,其中包括 1949 年成立的墨西哥工农联合会(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y Campesinos de México, UGOCM),1963 年成立的独立农民中心(Central Campesina Independiente, CCI)和 1970 年成立的墨西哥农业委员会(Consejo Agrarista Mexicano, CAM)。虽然这些组织都曾或多或少地挑战过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垄断地位,但这些组织或是被革命制度党“收编”,成为官方农民组织的组成部分,或是在与革命制度党的结盟中获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国农民联合会是印第安民众获取土地和资源开发的主要渠道,几乎所有的印第安民众都加入了这一职业社团。

农民职业社团的第一要务是以土地为纽带,将文化层面上不同于混血人种的土著人彻底整合至民族国家之中。农民职业社团在土地分配的实施中明显体现出这一导向。有研究显示,墨西哥大革命后,全国农民联合会分配的土地中,占比 80% 的大庄园的土地被分给了自认为是混血身份的农民,只有 20% 的土地是以共有财产的方式“归还”给了自认为是“纯土著”的居民。^② 这一政策导向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土地分配中明显偏向于混血的导向促使更多的土著人开始在现实层面上思考自身的身份。以语言为族群身份确立标准的实际情况也在事实上为土著人身份的转变赋予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其次,土地分配的不足,激发了更多的土著人强化与农民职业社团的联系,在国家社团体系的框架下表达自身诉求,推动更多的土著人加入农民职业社团。

在土地分配制度外,革命制度党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力求让土著人更为彻底地融入国家。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革命制度党政府大力推动了“土著主义”(Indigenismo)项目。这一项目旨在推动“土著人在社会和文化上融入国家,实现土著人的墨西哥化”。^③ 在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背景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力求通过对传统农业生产集中化、工业化的改造,改变土著村社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土著居民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体系。革命制度党政府在土著社区建立了合作社与车间学校,派遣农业技术专家讲授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法与技术,并以农业合作社和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在推动农村与土著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瓦解土著村社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传统。此外,依靠农民职业社团,革命制度党政府在土著社区发起了包括完善农业灌溉,建立农业信贷体系在内的多项改革。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土地资源减少,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革命制度党政府更是将土著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从土地分配转移到增加农业公共投资上。尤其是在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1970—1976)和何塞·洛佩兹·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1976—1982)执政期间,革命制度党政府极大地提升了对土著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农业职业社团也将自身

^① Hubert C. de Grammont y Horacio Mackinlay, “Las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campesinas e indígenas frente a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y el Estado, México 1938—2006,”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8, No. 4, 2006.

^② Horacio Mackinlay, “La CNC y el nuevo movimiento campesino (1989—1994),” en Hubert C. de Grammont eds., *Neoliberalismo y organización social en el campo mexicano*, Ciudad de México: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1996, pp. 165—238.

^③ Gunther Dietz, “Del indigenismo al zapatismo: la lucha por una sociedad mexicana multi-étnica,” en Nancy Grey Postero y León Zamosc ed., *La lucha por los derech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Quito: Editorial Abya Yala, 2005, pp. 53—128.

职能从土地分配转移到对农业的信贷与补贴、基础设施工程和各项政府主导的农业生产计划的参与上。^①

从1917年颁布宪法,宣布在农村地区发起土地改革,到1992年宪法第27条修改对印第安人土地分配与保护的彻底中断,持续数十年的土地改革最终摧毁了迪亚斯时代的土地所有制,超过300万的印第安民众获得土地,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也极大地改善了土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在解决殖民时代以来影响墨西哥社会稳定的土地问题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土著人对墨西哥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墨西哥国内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结 语

梳理20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是建立在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性和主体性思考的基础之上,是革命制度党政府对民族发展道路自主性、独立性的探索。这一方案的实施,虽然存在将土著人边缘化、同化的倾向,以及对土著人权益与政治参与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但彻底改变了殖民时代以来土著人不被认可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殖民时代以来困扰墨西哥社会发展的土著人问题。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国家象征地位的确立,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将土著人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范畴,极大地强化了土著人的国家认同。正是在这一政策下,墨西哥结束了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实现了国家的安定,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墨西哥政府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革命制度党放弃了以整合为导向的,主张融合的民族国家建设方案,正式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建立“新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将土著人定义为市场经济中自由、独立的主体。随着国家与土著人之间社团主义的纽带被切断,失去国家庇护的土著人遭遇了经济危机与文化遗产的多重困境。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萨帕蒂斯塔运动(El Movimiento Zapatista),数千名土著人占领了多个城镇,反抗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土著人的压迫。时至今日,萨帕蒂斯塔运动一直尚未得到解决,成为困扰墨西哥历届政府的重要问题。在萨帕蒂斯塔运动的影响之下,墨西哥各地族群运动也呈现出持续爆发的态势。然而,无论是偏远山区的萨帕蒂斯塔运动,还是首都墨西哥城的土著人抗争运动,墨西哥境内所有的土著人运动均无涉国家分裂的诉求,表达的是统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发展诉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族群问题在墨西哥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革命制度党政府民族融合的国家一体化方案“演进”的继续。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Hubert C. de Grammont y Horacio Mackinlay, “Las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campesinas e indígenas frente a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y el Estado, México 1938—2006,”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8, No. 4, 2006.